

# 中国方志史初探

刘绍毅

## 引 言

地方志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它广泛而详密地记录了地方的建置、沿革、疆域、山川、形势、关隘、津梁、古迹、寺观、物产、田赋、灾异、风俗、职官、人物、金石、艺文等自然和社会史料，被人们视为“博物之书”（司马光语）、“一方之全书”（章学诚语）。它不仅一直是研究我国历史、研究地方史的重要资料；而且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建设、国防建设和科学研究，都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。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上曾倡议编修地方志。周恩来同志在同年八月九日，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邓衍林教授的谈话中说：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，各县都编有县志，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关于各地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。我们除编印全国所藏方志目录外，还要有系统地整理县志中及其他书籍中的有关科学技术资料，做到古为今用。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九年，又向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同志询问了方志的编修情况，并指示档案局“对新旧地方志你们都要把它收集起来。”<sup>①</sup>在毛泽东、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，四川、湖南、湖北、甘肃、青海等省，先后成立了编纂地方志的专门机构，并有一百五十多个县（市）编印了地方志。但十年浩劫，使刚刚兴

起的编修新地方志的事业被迫中辍。今天，我们在向四个现代化的进军中，古代方志必将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；同时，编修新志也必将重新提到史学界和各地领导机关的议事日程上。本文就我国地方志发展史试作探讨，以抛砖引玉。

## 一、汉魏六朝时期

地方志，或称方志，或称志乘，起源很早。两千多年前的西周，就有“外史，掌四方之志”的记载。汉代郑玄对“四方之志”一语作了注解。他说：“志，记也。谓若鲁之《春秋》、晋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檮杌》”<sup>②</sup>。按郑玄的解释，史书记载的孔子修《春秋》，求周史记“得百二十国宝书”，也可以说：孔子是看了一百二十部方志，写成了《春秋》。但从传世的《春秋》来看，因为它是一部纯社会政治的编年史，不具备地方志的地方性、广泛性，所以后人并不把它列为地方志。但方志之名却沿用下来了。有人说我国方志起源于《禹贡》。诚然，《禹贡》是我国地理书的鼻祖；但因为它不“以地域为记载中心”，不合方志的概念，所以历来目录学家、史学家并不认为它是最早的地方志。

我国地方志实际创始于东汉。最早的作品当推东汉初年的《南阳风俗传》。光武帝刘秀，为彰乡里之盛，诏撰《南阳风俗传》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：“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《风俗传》，故沛、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，鲁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传。郡国之书，由是而作。”这些“郡国之书”，就是原始的地方志。可惜早已佚失，无从稽考。

东汉的《巴郡图经》，是我国方志最早作品之一。后世多称方志为图经者，其源亦始于此。“图则作绘之名，经则载言之别”<sup>③</sup>，可见它是既有舆图、又有文字记载的方志之祖。此书已早佚，但《华阳国志》里却征引了它的一段文字。这是我们现在

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志记述了。这段记述谓：汉桓帝永 兴二年（公元一五四年），巴郡太守泰山但望上疏曰：“谨案《巴郡图经》，（巴郡）境界南北四千，东西五千，周万余里，属县十四，盐铁五官，各有丞史，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，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。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里，乡亭去城或三四百，或及千里云。”<sup>④</sup>这段文字，记述了巴郡的建置、疆界、人口，同时也说明《巴郡图经》至晚也产生在汉桓帝时。

晋代挚虞编纂的《畿服经》，是最早的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方志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史部地理类谓：“晋世挚虞，依《禹贡》、《周官》作《畿服经》，其州郡及县分野、封略、事业、国邑、山陵、水泉、乡、亭、城、道里、土田、民物、风俗、先贤、旧好，靡不具悉，凡一百七十卷，今亡。”

东晋时常璩著的《华阳国志》，是传世的最早地方志。其书所述，始于传说中的远古，终于永和三年（公元三四七年）。凡十二卷，为巴志，汉中志，蜀志，南中志，公孙、刘二牧志，刘先主志，刘后主志，大同志，李特、雄、期、寿、势志，先贤士女总赞论，后贤志，序志，三州士女目录。此书记述巴蜀地理、风俗、史迹、人物尤详。后世编修四川、云南方志者，必据以为典则。但因常璩是李势割据政权成国的散骑常侍，其书又载成国帝王之事，所以历代目录学家多把它列为“伪史”或“霸史”。

汉魏六朝的方志，据《隋书经籍志》引自南齐陆澄《地理书》和梁任昉《地记》二书所载，为二百四十四种。但到唐初仅存十分之二了。留传至今的则寥寥无几，除了上述《华阳国志》外，尚有：《娄地记》（三国吴顾启期撰）、《冀州记》（晋裴秀撰）、《三晋记》（北魏王遵业纂）、《荆州记》（刘宋盛弘之撰）、《沙州记》（刘宋段国撰）、《吴兴记》（刘宋山谦之撰）、《会稽记》（刘宋孔灵符纂）等书的辑佚本了。

这些方志，或记地理、或叙风俗，或写人物，或述事迹，大多内容比较专一，文字比较简略，体例也不严谨。不象后世方志那样内容广泛，体例完善。应当说这个时期是我国方志的雏形时期。

## 二、隋唐时期

隋唐之际，由于国家的统一，经济文化的发展，地方志有了新的的发展。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、有组织的编修方志的活动，并产生了我国最早的地方志总志。

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连续三百多年的战乱和分裂局面后，对全国行政区划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，精简了五百多个州郡，存“郡百九十，县一千二百五十五”。为了适应中央政权对地方控制的需要。隋炀帝在大业中年，“普诏天下诸郡，条其风俗、物产、地图上于尚书。”在此基础上编纂地理志书，“故隋代有《诸郡物产土俗记》一百三十一卷，《区宇图志》一百二十九卷，《诸州图经集》一百卷，其余记注甚众。”<sup>⑤</sup>这些地方志总志其内容之丰富、卷帙之众多，为前代志书所莫及。（《区宇图志》为虞世基奉敕撰，《诸州图经集》为郎蔚之撰。）这是我国历史上中央政权编纂地方志总志的开端，为以后历朝统治阶级所效法。

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、文化发达的时期，地方志也就出现了空前的繁荣。贞观十五年，太宗第四子李泰和著作郎萧德言修纂了一部《括地志》，五百五十卷。唐太宗看了之后极为赞赏这部地方志总志。“太宗诏曰，博采方志，得于旧闻，旁求故老，考于传信，内殫九服，外极八荒，简而能周，博而尤要，度越前载，垂之不朽。”<sup>⑥</sup>此书也早散佚，清代学者王谟、孙星衍皆有辑本，但不及原书百分之一。

唐德宗建中元年（公元七八〇年），规定各州郡每三年编造

一次图经送职方，后改为五年一造送，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，则不在五年之限<sup>⑦</sup>。因此，图经形式的地方志在唐代极为发达。从现存的《沙州图经》残卷来看，它记载了沙州（今甘肃敦煌）的天象、水利、驿站、寺庙、古迹、歌谣、祥瑞等；其中十九个驿站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，但不见于其他史籍，可补新旧唐书之不足。

宪宗元和八年（公元八一三年），二次担任宰相的李吉甫纂修了著名的地方志总志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四十卷。按当时全国四十七镇分列，每镇篇首有图，故曰图志。到了南宋淳熙年间，图亡，故后人改名为《元和郡县志》。此书对当时全国各府、州、县的疆域、山川、阨塞、沿革、户口、贡赋、物产、名胜古迹，均有详细记载，是我国汉唐地理志之集大成者。为历代学者所重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谓：“舆记图经，隋唐志所著录者，率散佚无存。其传于今者，惟此书为最古，其体例亦为最善。后来虽递相损益，无能出其范围。”

咸通三年（公元八六二年），樊绰任唐安南经略使蔡袭幕僚，撰《蛮书》十卷（《宋史·艺文志》谓《云南志》，又作《南蛮记》，《永乐大典》谓《云南史记》）。全面记载了当时云南的山川、交通、六诏历史、各族概况、城镇、物产、风俗及经济、政治制度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谓：“实舆志中最古之本，宋祁作新史南蛮传、司马光《通鉴》载南诏事，多采用之。”

唐河东节度使李璋撰《太原事迹记》十四卷。据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：《晋阳事迹杂记》十卷，盖宋时所删，治平中年太原府所刻。这是我国雕版印刷的最早的一部方志，可惜宋室南渡后泯亡。

唐代徐坚首次提出了“方志直文”的理论。他主张编写方志应当像司马迁写《史记》那样，“其文直、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

恶”<sup>⑧</sup>。尽管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不可能真正做到这些要求。但徐坚能第一次提出这种实事求是的纂修方志的原则，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。

隋唐地方志多达一百余种，但留传下来的只有十之二三。除上述外，尚有下列几种辑佚本传世：《贞元十道录》（唐贾耽纂）、《十道四蕃志》（唐梁载言纂）、《吴地记》（唐陆广微撰）、《闽中记》（唐林谿撰）、《东京记》（唐韦述纂）、《岭南异物志》（唐孟珙纂）、《晋阳记》等。

### 三、赵宋时期

宋代是我国方志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，一方面是数量的猛增，大大超过汉唐方志的总和，一方面是体例的完备，为后世方志的发展创制了规模。

五代十国的动乱，使盛唐时期的八万多卷藏书，到了宋代初年“存者百无二三。”因而赵宋政权对包括地方志在内的文化典籍的征集和编纂，特别注重。它承袭唐代三年一造图经的制度，规定“凡土地所产，风俗所尚，具古今兴废之因，州县之籍，遇闰岁造图以进。”<sup>⑨</sup>开宝“四年（公元九七一年）正月戊午，（太祖）命知制诰卢多逊、扈蒙等，重修天下图经。其书讫不克成。六年四月辛丑，多逊使江南，求江表诸州图经，以备修书，于是十九州形势尽得之。”八年，宋准受诏修定《开宝诸道图经》<sup>⑩</sup>。后佚。

真宗景德四年（公元一〇〇七年），诏诸道修图经。之后命翰林学士李宗谔修纂《祥符州县图经》一千五百六十六卷，并颁下州县<sup>⑪</sup>。此书宝庆年间已佚其十之六七，后又亡失殆尽。

神宗元丰八年（公元一〇八五年），诏三馆秘阁，删定《九域图》，后由尚书右丞王存纂定为《元丰九域志》十卷。<sup>⑫</sup>

徽宗大观元年（公元一一〇七年），朝廷创置九域图志局，命州郡编纂图经<sup>⑭</sup>。

朝廷三令五申修志造图，是前所未有的事情。这就使方志有了极大的增长。据张国淦编著的《中国古方志考》统计，宋代方志近六百种，大大超过了以前历代方志的总和。几于“僻陋之邦、偏小之邑，亦必有记录焉。”<sup>⑮</sup>

宋代方志在我国方志史上之所以重要，更在于体例之完备，内容之详审，实具首创精神。汉唐方志，多数都详于地理，略于人文，或专记某一方面，应当说是不太完备的方志。太平兴国中年，太常博士直史馆乐史撰的《太平寰宇记》，取《华阳国志》、《诸道山河地名要略》之长，于地理之外，增加了姓氏、人物、风俗数门，又因人物详及官爵、诗词、艺文。自此，方志的内容就包罗万象，“体例亦自是而大变”<sup>⑯</sup>。这一重要突破使方志由舆地之书，迈向了史学领域，极大地提高了地方志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。如南宋朱熹，在淳熙六年上任南唐军时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索看方志（“首以郡志为问”）。

宋代方志比较著名的有《新安志》、《剡录》、《吴郡志》。

《新安志》，宋赵不悔修，罗愿纂，十卷。第一卷为州郡，第二卷为物产贡赋，第三至五卷为所属之歙、休宁、祁门、婺源、绩溪、黟六县；第六卷、七卷为先达；第八卷为进士题名，凡贤良、明经、赐策、献策、特奏、名武举，皆附之，义民、仙释亦并录之，第九卷为牧守，十卷为杂录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评价此书谓“叙述简括，引据亦极典核。于先达皆书其官，别于史传，较为有体；其物产一门，乃（罗）愿专门之学，征引尤为该备。”

《剡录》，即浙江嵊县县志。嵊县汉为剡县，故名《剡录》。宋史安之修，高似孙纂，十卷。其编写体例，为后世所仿。“其

先贤传，每事必注，其所据之书，可为地志纪人物之法；其山水记，仿酈道元《水经注》例，脉络井然，而风景如睹，亦可为地志纪山水之法。”<sup>⑩</sup>此书卷五著录阮裕、王羲之、谢灵运等十四人的著述及阮、王、谢三氏家谱之名目共四十二种，各列其卷数，开创了方志记载地方著述书目之先例。

《吴郡志》，宋范成大纂，五十卷。内容广博，而井然有序。其子目有沿革、分野、户口、税租、土贡、风俗、城郭、学校、营寨、官宇、仓库（场务附）、坊市、古迹、封爵、牧守、官吏、祠庙、园亭、山、虎丘、桥梁、川、水利、人物（列女附）、进士题名（武举附）、土物、宫观、府郭寺、郭外寺、县记、冢墓、仙事、浮屠、方技、奇事、异闻、考证、杂咏、杂志，共三十九门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评它“为地志之善本”。

#### 四、元明时期

元明时期的方志，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，又有新的成就。

元朝灭金并宋后，我国再次出现了空前大一统的局面。史称“北逾阴山，西极流沙，东尽辽左，南越海表。”世祖至元二十三年（公元一二八六年），集贤大学士札马里鼎奏称：“方今尺地一民，尽入版籍，宜为书以明一统。”世祖采纳这个建议，遂命札马里鼎、虞应龙等，以职方所上版图，纂为《大一统志》，凡七百五十五卷。元贞二年三月得《云南图志》，大德二年二月又得《甘肃图志》，三年七月又得《辽阳图志》等书，乃显《大一统志》之缺漏甚多，故集贤待制赵忭建议重修一统志。成宗嘉纳，命孛兰朮、岳铉等主其事，重修一统志。大德七年，书成，名《大元一统志》，凡一千三百卷。其书“于古今建置沿革，及山川、古迹、形势、人物、风俗、土产之类，网罗极为详备。诚

可云宇宙之巨观，堪舆之宏制矣！”<sup>⑩</sup>明初修《元史·地理志》多依据此书。《明一统志》也以此书为蓝本。

元大德二年(公元一二九八年)著名农学家王桢在作安徽旌德知县时，修纂了《旌德县志》，并用自己创制的木活字印刷了一百部。这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首创<sup>⑪</sup>。

明代封建王朝，深知“治天下以史为鉴，治郡国者以志为鉴”<sup>⑫</sup>，从中央到地方都对方志的修纂极为重视。洪武三年，太祖命儒臣魏俊等六人，编类天下郡县地理形势，为《大明志书》(不传)。永乐十六年，成祖“诏天下郡、县、卫、所皆修志”，命儒臣纂修天下郡县志(书成而未刊)。英宗复辟后，命李贤等重编，天顺五年书成奏进，赐名《大明一统志》<sup>⑬</sup>。

元明两代几修一统志，地方政权修纂方志也就蔚然成风。据《中国古方志考》、《中国方志联合目录》(初稿)统计，元明方志达一千二百多种。许多省、府、州、县志书，是一修再修。如《山西通志》，首创于成化，续修于嘉靖，再修于万历。再如江苏《六合县志》在明代二百七十七年中，竟修六次之多。

元明方志中，以下列的几种较著：

《齐乘》，元于钦纂，六卷，此书专记山东輿地，分八类，为沿革、分野、山川、郡邑、古迹、亭馆、风土、人物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谓此书“叙述简核而淹贯，在元代地志之中，最有古法”，“向来推为善本”。

《武功县志》，康海撰。康海，武功人，弘治壬戌进士第一，授翰林院修撰。后被削籍返乡。此志，即回乡后所作。全书三卷，分七篇：凡山川、城郭、古迹、宅墓，归以地理篇；官署、学校、津梁、市集，归以建置篇；祠庙、寺观归以祠祀篇；户口、物产、附于田赋篇；艺文则用《吴郡志》例，散附各条之下，以除冗滥；官师则善恶并著，以寓劝惩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谓“乡国

之史，莫良于此”，“后来志乘，多以康氏为宗。”历来方志对职官的载录，都是“有美无刺，隐恶扬善”，“恶者不录”的。而《武功县志》则有褒有贬，“恶善并著”。这不能不说是康海在方志史上的创新。

《滇略》也是一部著名的明代方志。谢肇淛将此书分为十门：一、版略，以记疆域；二、胜略，以记山川；三、产略，以记物产；四、俗略，以记民风；五、绩略，以记名宦；六、献略，以记乡贤；七、事略，以记故实；八、文略，以记艺文；九、夷略，以记少数民族；十、杂略，以记琐闻。其体例特为雅洁，为云南之“善史”。②

处于蒙古的瓦剌和鞑靼是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敌寇，为了巩固边防，明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方志形式——边务图志。嘉靖初年，职方主事郑晓，“尽知天下厄塞、士马虚实强弱之数，”受兵部尚书金献民的委任、撰《九边图志》，“人争传写之”。③刘效祖撰的《四镇三关志》十卷（四镇为蓟州、真保、辽东、昌平；三关为居庸、紫荆、山海），志内有各镇地图、各种兵器、车营、敌台图，对四镇三关之形胜、军旅、粮响、骑乘、职官、才贤均有详细记载。苏祐撰的《三关纪要》三卷（三关即雁门、宁武、偏头），和五次修辑的《山海关志》，都是边务志的代表作。

## 五、清朝时期

清代是我国方志史上的极盛时期。清朝取代了明王朝以后，又出现了经济发达、文化繁荣的局面。清政府把方志当做“昭同轨、同文、同伦之盛”的得力工具，因此自上而下都特别重视方志的修纂。

康熙十一年七月，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（山西曲沃人），进

奏：“各省通志宜修，如天下山川、形势、户口、丁徭、地亩、钱粮、风俗、人物、疆圉、险要，宜汇集成帙，名曰通志”，以汇《大清一统志》之用。圣祖玄烨允其所请，诏“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，接古续今，纂辑通志。”<sup>②</sup>同时，并将顺治十八年河南巡抚贾汉复（山西曲沃人）主修的《河南通志》，“颁著天下为式”。

康熙二十二年，礼部奉旨檄催天下各省通志，限三月成书。

康熙二十九年，河南巡抚通令所属府、州、县纂辑志书，其通飭修志牌照，列具凡例二十三条，对修志中何详何略、何取何弃，何须实地调查，何须探本溯源，均有详细规定。如山川条，要求“须考，果系封内者方载入，而不可遗漏。河道要将近日所开浚淤塞变迁等查明，其间事实，备细注明，不可以小说搀入。”如人物条，要求“圣贤忠贞并入，其科贡等必载其家世、时代、年月、字、号、某科、某项。若系乡贤，为立一小传于后。”再如，在艺文条里，规定“八景不可录，录必录其佳者。”<sup>③</sup>在大规模的修志中，这样的修志牌照，无疑是能够减少一些粗制滥造的。

雍正七年，复诏各省纂修通志，以备一统志之采择。以后又颁布了各省、府、州、县志六十年一修之命令。特别是乾嘉之际三修《一统志》，形成了举国上下修辑方志的高潮。

因此，清代方志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。据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（初稿）统计，清代方志达5800多种，大大超过以前历代方志总数。不仅省、府、州、县各有其志书，甚至一些村镇乡里也首次出现了志书。如《甘棠小志》（甘棠系江苏甘泉县邵伯镇之别名），《杏花村志》（安徽池州杏花村），《天津杨柳青小志》、广东《佛山忠义乡志》、吴兴《双林镇志》等，都是这类方志的较著者。

清代方志之所以如此盛行，和学术界的重视有极大的关系。如顾炎武为了实践他“经世致用”的主张，博览群书，并引用了大量方志中有关地理形势、水利、赋役、自然资源和自然灾害等资料，撰写了著名的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。万斯同在他一生治学中，贵于征实，“郡邑志乘，杂家志传之文，靡不网罗参伍。”钱大昕“校正地志，于天下古今沿革分合，无不考而明之。”并修纂了《长兴县志》、《鄞县志》。还有很多著名学者都参与了地方志的修纂，如黄宗羲修《浙江通志》，戴震参订《汾州府志》，王鸣盛纂《嘉定志》，并为《曲沃县志》作序。孙星衍纂《偃师县志》，朱彝尊修《新安志》，洪亮吉纂《怀庆府志》、《登封县志》、《固始县志》。龚自珍写了《青海志·序》，缪荃孙修《顺天府志》。

我国方志虽然历史悠久，但宋代以前方志十之八九都已亡佚。因此清代就出现了古方志的辑佚工作，即一些学者把唐宋类书或其他史志所征引的古方志的资料，辑录起来汇为一书。如王谟辑佚的《汉唐地理书钞》，收汉唐地志五十种。马国翰、王仁俊辑的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》，收载唐代以前方志约六十种。陈运溶的《麓山精舍丛书》，辑录了宋代以前方志七十五种。孙诒让辑录了南朝刘宋的《永嘉郡记》刻成单行本行世。这在方志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。是清代学者的一大贡献。

我国方志虽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，但过去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。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不仅有纂辑《和州志》、《永清县志》、《湖北通志》的实践，而且对方志研其性质、定其范围、掣其要领、规其体例、探其技巧，甚至编修方志的机构设置，都有系统的和独到的见解，为方志学的建立作出了贡献。

章实斋主张“志乃史体”，反对方志属地理的传统观点。他说：“有天下之史，有一国之史，有一家之史，有一人之史。传

状志述一人之史也；家乘谱牒，一家之史也；部府县志，一国  
之史也；综记一朝，天下之史也。”<sup>⑥</sup>他主张修志要“除八忌”，即  
忌修理混杂，忌详略失体，忌偏尚文辞，忌妆点名胜，忌擅翻旧  
案，忌浮记功绩，忌泥古不变，忌贪载传奇。章氏竭力反对“舍  
今而求古，舍人事而言性天”的不良学风，主张“必求当代典章，  
以切于人伦日用”。这些切中志书弊病的灼见，对纂修方志发生  
了重大影响，使清代方志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向前迈进了一步。  
如宁夏《隆德县志》总结了观察地震先兆的经验，归纳为  
“地震六端”：一、井水本湛静无波，倏忽浑如墨汁，泥渣上浮，  
势必地震；二、池沼之水，风吹成苻交萦，无端泡沫上腾，若沸煎  
茶，势必地震；三、海面遇风、波浪高涌，奔腾汩汹，此常情。  
若风日晴和，台飓不作，海水忽然绕起，汹涌异常，势必地震；  
四、夜半晦黑，天忽开朗，光明照耀，光异日中，势必地震；  
五、天晴日暖，碧空清静，忽见黑云如缕，蜿蜒如长蛇，横亘空  
际，久而不散，势必地震；六、时值盛夏，酷热蒸腾，挥汗如雨，  
蓦觉清凉，如受冰雪，冷气袭人，肌为之栗，势必地震。象这样全  
面总结地震的端倪，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，就是对今天群  
众性预测预报地震，也仍有现实意义。再如乾隆《曲沃县志》，  
考证出晋国曲沃古城，不在汉魏以来史学家一直认为的今闻喜  
县，而在今曲沃县城南二里之古城；晋都新田不在今曲沃城，而  
在侯马。这一新解，为解放后在侯马发现的“新田遗址”所证实。  
仅这一鳞半爪，亦可窥见清代方志之史料价值。

## 结 语

我国方志，源远流长。其所以能不断发展，固然和历代统治  
阶级的提倡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，但内在的因素则在于它有着特  
殊的功用，而为社会所重视。近人瞿宣颖总结了方志之六大功用，

较为全面、深刻。他说：“社会制度之委曲隐微不见于正史者，往往于方志中得其梗概，一也；前代人物不能登名于正史者，往往于方志中存其姓氏，二也；遗文佚事散在集部者，赖方志然后能以地为纲有所统摄，三也；方志多详物产税额物价等类事实，可以窥见经济状态之变迁，四也；方志多详建置兴废，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，五也；方志多详族姓之分合、门地之隆衰，往往可与其他史事互证，六也。”<sup>②</sup>

但，旧日方志，大多为封建统治阶级所纂修，就是少数私修者，也出于封建文学儒士之手。因而封建糟粕充斥其中。其通病有五：一、对帝王、官宦、文士、豪绅，是隐恶扬善，歌功颂德；而对劳动人民、农民起义，不予载录，或诋毁辱蔑。二、渗透着孔孟之道、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思想，宣扬纲常名教的烈女、节妇、孝友之类，都在方志里占有一定的篇幅。三、鄙视社会生产实践，不反映劳动人民在生产技艺上的革新和首创。四、最能表明一地风俗民情的歌谣、词曲、音乐、戏剧、手工艺等，因为在封建道学看来“有伤风化”或曰“雕虫小技”，而不能载于方志。五、用迷信观点解释某些自然现象，以荒诞的文字渲染某些事物。至于“例行公事”而粗制滥造的方志，也不乏见。即或旧时认为比较好的方志，也多有讹误、附会之处。我们在研究和利用古代方志时，是不得不加以分析批判和稽核考证的。

注：

①曾三《回忆周总理领导我们建设档案事业》，《人民日报》一九八〇年一月七日。

②《周礼郑氏注》卷六。

③《玉海》十四，祥符州县图经条。

④《华阳国志》卷一巴志。

- ⑤《隋书经籍志》。
- ⑥《玉海》十五，唐括地志条。
- ⑦《唐会要》卷五十九，职方员外郎。
- ⑧《初学记》卷二十一。
- ⑨《宋史》卷一六三，职官志。
- ⑩《玉海》十四，开宝修图经条。
- ⑪《玉海》十四，祥符州县图经条。
- ⑫《玉海》十五，熙宁九域志条。
- ⑬张国淦《中国古方志考》第三五四页，宋元四明六志余考。
- ⑭张国淦《中国古方志考》第四三八页，《仙溪志》黄岩孙跋。
- ⑮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六十八，太平寰宇记。
- ⑯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六十八，刻录。
- ⑰张国淦《中国古方志考》第一一七页，吴騫《元大一统志残本跋》。
- ⑱张秀民，《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》第八十页。
- ⑲嘉靖《山西通志》，杨宗气序。
- ⑳傅维麟《明书经籍志》。
- ㉑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六十八，滇略。
- ㉒《明会要》卷三十二，职官兵部。
- ㉓康熙《山西通志》，条议。
- ㉔瞿宣颖《方志考稿》第四编八十二页。
- ㉕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外编，州县请立志科议。
- ㉖瞿宣颖《方志考稿·序》。

一九八〇年三月四日初稿，七月五日修改